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7月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内涵。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从党的组织路线历史中发展而来的。回顾建党至今党的组织路线发展历程，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党的组织路线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

党的组织路线的历史发展进程

□王定毅

党的组织路线是党根据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而规定的关于组织工作的根本方针和准则。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线，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在革命岁月的洗礼中逐步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党成立伊始，党部就对党的地方组织机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做出了明确规定，这表明，我们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党的二大、三大对党的中央组织、组织系统与结构、党员等做出了具体规定。党的四大更是将组织建设放到首要和突出的位置。1928年召开的党的六大，第一次提出了“组织路线”的概念，在组织路线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先后犯了右倾和“左”倾的错误，同时他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因此共产国际认为，他们之所以犯错误，与他们的出身有很大的关系。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虽然工人出身但是政治、文化素质都比较低的向忠发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而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在使用中受到限制。向忠发不仅没有起到党的领袖应有的作用，而且后来在被捕中成为叛徒。之后，由于当时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几乎导致革命的再次失败。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由于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作为指导，7年前还是“左”倾错误代表的王明，陡然转为右倾错误的代表，他要求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领导，同时不断挑毛泽东和中央的权威。1938年9月14日，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指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15天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正是在这次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著名论断，并且提出了领导干部的标准是“才德

兼备”，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这些论断和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组织路线已经确立。组织路线确立的过程，凝结着党革命事业成败的经验教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党的干部用智慧、鲜血铸就的。组织路线确定一年之后的1939年，我们党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在正确的组织路线的指引下，党的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全党达到空前团结，并于1945年取得了抗日战争胜利，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在建设年代的探索中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党的干部要学会建设、管理城市，各项工作都要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来开展。1956年底，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在中国特殊的国情基础上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1957年毛泽东提出“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又红又专”成为组织路线的代表性词汇，要求干部既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又要尽快由各项建设事业的外行变成内行；要求知识分子既要改造政治思想，又要搞好专业研究。

1960年代，国际环境日趋紧张，中苏矛盾升级。1964年，毛泽东从防止“出赫鲁晓夫”的角度出发，提出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党的组织路线也随着发生严重偏差，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组织路线也遭到践踏。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丰富创新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任务。然而，当时干部队伍普遍存在“老化”问题，而且相当多的干部缺乏经济管理经验，这种状况与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严重不相适应。邓小平在1979年7月就提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的论断。1979年9月5日至10月7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党在新时期的组织路线主要内容是，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促进并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根据这一组织路线，组织部门的每项工作，都要从有利于经济建设出发，从有利于两个文明建设出发，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这个主心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第一次完整提出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并把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提到了关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干部队伍“四化”方针首次被写入中央全会文件，后又写入十二大党章。干部“四化”方针的提出，是对党历来强调的德才兼备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应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我们党依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着眼完成党的历史任务，对干部工作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以壮士断腕的气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党的建设取得了卓著成效。在这种深层次、根本性的党建实践中，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应运而生。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十八大以来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成功实践的思想结晶，是近百年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广泛而深刻的实践基础上的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开创性贡献。

陈云与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

□ 聂文婷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为统一财经和稳定物价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在推进经济改革方面进行了诸多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贡献。他锐意改革，率先支持并大力推动农村改革；他实事求是，成功领导中国国民经济再调整；他与时俱进，大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他高瞻远瞩，积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支持包产到户，推动农村改革率先取得突破

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暗中决定把田分给各户，即实行包产到户。但是，这一做法却不符合当时中央一些文件规定。一时间，包产到户面临很大压力。早在1950、1960年代，陈云就曾提出放宽农村政策、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以搞活经济的主张，甚至还设想用分田到户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生产积极性，但却受到了错误的批判。

陈云认为，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提高农产品产量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办法，而包产到户正是这样一种好办法。因此，对于包产到户，陈云非常认可。1979年6月18日，陈云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式。会议休息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与陈云就安徽一些农村搞包产到户的情况进行了交谈。正是在这次谈话中，陈云对包产到户作出了“双手赞成”的表态。

关键时刻，陈云的一句“我双手赞成”，让万里定了心，也让包产到户开始在阳光下试行。到1981年底，农业生产责任制在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中得以确立。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包产到户得以合法化，农村改革的大势也随之确定。

实行包产到户，说到底，是经济管理体制的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对此，陈云曾说：“目前搞的经济管理体制改

□ 贺全胜

容错纠错是保护和激励干部改革创新、担当作为、砥砺奋进的制度设计。中央办公厅颁行《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建立健全干部容错纠错机制，为锐意改革、勇于担当提供了根本遵循。干部容错纠错工作应注重三个着力点。

科学把握容错的内涵和底线，是推进容错纠错的现实动力。容错能够激发和提振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一要准确把握容错的内涵。容错即行政容错，是指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由于工作方法简单、经验欠缺或路径选择失策、不确定性下难以预判、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而导致的可从轻处分或免责的过失性错误，不包括政治容错、道德容错。二要科学界定容错边界，规避容错随意自由裁量扩大化。探索实践、工作失误、无意过失是容错的表现形式，而有规不循、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则不是容错的表现形式。因此科学界定容错的边界，严格区分改革创新中不确定性下工作失误、制度不完善情况下前瞻性决策误判、处理社情民意问题中试错过失，有利于规避容错随意自由裁量扩大化倾向，减少行政程序和行政成本。三是开列容错的负面清单，划定容错红线和底线。划定容错不

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事实证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路子是对的，在当时，坚决主张和支持搞包产到户的陈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远见的。

力主综合平衡，成功领导国民经济再调整

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正式开启之前，陈云还成功领导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大规模国民经济调整，为我国经济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奠定了基础，更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

“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间，国民经济得到较快恢复。但与此同时，经济工作中也刮起了一股大干快上、急于求成的冒进之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严重。这样一种倾向，势必会影响接下来改革的进程。正如陈云所言“站稳以后的前进是更踏实的前进”，在觉察和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陈云多次提出要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再进行经济改革。他认为，只有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在一个健康稳定的运行基础上积极而又稳妥地进行。

早在1978年7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陈云就主张国民经济“要搞好综合平衡，国内工作要跟上，不然又会出现新的混乱”。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党中央，强烈建议：国民经济“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长期看来，“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一周之后，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初步形成了关于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决策。同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肯定了陈云的调整思想，明确规定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事实上，这时候全国从上到下快速发展经济的心情仍然极为迫切，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就意味着改革的某些方面要后退，因此，调整方针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坚决的落实。到1980年底，不仅基本建设规模没有缓降下来，财政收支还连续两年严重赤字。

严峻的现实，让陈云更加睿智冷静，也更加笃定：调整国民经济，势在必行。为使调整方针得以全面落实，陈云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一方

面，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陈云对宝钢等特大项目的进退取舍进行了客观合理的论证。另一方面，陈云还不断研究国情实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速度与效益等辩证关系，从而对有助于调整的诸多错误认识作出了正确回应。最终，在陈云的执着探索和亲自指导下，调整方针得以有效贯彻。1983年，我国提前两年完成了1981年至1985年五年计划目标，这就为十二大以后的经济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着眼市场取向，深入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是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作为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领导者，陈云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可以说，陈云是最早从理论角度将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经济范畴的领导人。他曾在1950年代就提出：“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改革开放后，陈云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又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思考。

1979年3月8日，陈云写出了一份系统探讨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文中，他直戳计划经济体制的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此，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后的经验和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陈云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要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个部分。“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陈云在这份提纲中阐述的意见，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是党内最早的以文字形式论述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文献，为经济体制改革要遵循怎样的原则和方向作出了战略性的指导。

此后，陈云还生动地把市场和计划的关系比作鸟和笼子，即是说：市场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市场调节必须在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运行。因此，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陈云的这一提法，虽然与此后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同，但它冲破了一直以来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

的传统观念，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先导，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也正由此而起步。

强调活而不乱，确保经济改革积极稳步向前

尽管陈云在1980年就不再兼任负责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但他始终心系经济体制改革，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经济要协调有序发展。

陈云认为，关于经济改革，首先要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这样做，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使改革成功。陈云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

1982年12月，陈云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市场搞活经济的政策。但同时，陈云还未雨绸缪地指出：“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因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这一建议，高瞻远瞩，意义重大，从全局角度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护航。中国改革开放风雨峥嵘40年，宏观经济形势基本走稳，没有出现大的风浪波折，这与陈云一贯的谨慎态度和稳重主张是分不开的。

在探索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陈云非常善于运用辩证思维破解经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并适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和新对策。例如，陈云认为，“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因此，他积极谋划对外开放的具体路径，大胆提出要到国外投资办厂的建议，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优化开放结构产生了积极作用。再比如，陈云对环境保护也有前瞻性的认识，在经济改革一开始，他便提出经济要发展，环境更要保护的策略策略。他的这些思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干部容错纠错的着力点

能触碰的党纪国法红线，不能逾越的工作规程和去私情谋公利底线。凡有重大政治风险、有重大主观过失或谋取私利、重特大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经济发展责任事故造成重特大破坏或损失的错误，列为容错的负面清单，切忌把容错当成怠政、渎职、乱作为的“护身符”或违法违纪的“保护伞”，贻害党威国业。

合理创设容错路径，是深化容错纠错的内在推力。综合考量容错的内涵要义、规程方法后果等因素，必须合理创设容错路径。一是笃力创设宣传引导、宽容试错的推动路径。主要通过政策宣示、专家宣讲、媒体宣传等形式，大力宣传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的先进人物，积极推介敢试敢为的容错好经验好典例，使干部群众知悉容错目的、政策和理论依据、适用情形、运行结果等内容，大力营造全社会崇尚创新、宽容试错的浓厚氛围，推动经济社会改革创新展发展。二是创立容错评估方法科学化路径。坚持“不告不理”原则，凡受理容错申请后，在明晰干部岗位职责、工作规程的基础上根据容错对象的一贯表现，采取定量分析和定性评价相结合的科学方法，定期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估结论。对于争议性较大或专业性较强的重大失误评估，应吸纳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组织机构“把脉”，确保容错评估方法的科学

性、准确性和公正性。同时根据政策法规和容错情形，创设容错纠错案例警示教育方法、现场反省鉴戒方法和整改典型镜鉴提高方法，确保容错纠错的针对性有效性。三是创设容错心理矫正路径。当前社会上对改革创新失误的宽容度还并不高，部分官员干部对容错心存疑虑，担心影响个人发展前途。必须端正容错观，矫正他们“怕而不为”“为而出错受伤害”等不良心理，为改革秉公创业、勤政清廉的干部撑腰鼓劲。四是创设容错监督检查、反向鞭策修复路径。加强容错纠错工作监督检查，防止容错机制的滥用，不使容错成为违法违纪的“挡箭牌”，容错纠错不纵错。以容错实例的反向鞭策修复功用，增强干部勇于探索创新、修正错误的精神力量。

建构完善执纪问责和容错免责相结合的协同机制，是实现容错纠错的制度张力。执纪问责是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责，容错纠错由组织部门牵头，综合评析，得出结论，二者必须相互配合、协同发力。一要致力建构严管和关爱干部相结合的协同并举机制。建构健全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严管和关爱干部相结合的容错协同并举机制，有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正确评价、大胆启用符合容错情形的干部，致力营造惩恶扬善、鼓励干事、严管和关爱干部相结合

氛围。二是完善容错整改和激励干部相结合的协同联动机制。建立完善党委与人大、纪检监察机关与组织人事部门相结合的容错协同联动机制，协同分析研究问题，总结容错经验，制定容错整改措施，切实保护和激励干事创新、担当作为的干部。三是建立警示防范和回访教育协同并重机制。开展法纪专题教育活动，通报典型案例予以警示提醒，组织、纪检、审计等部门积极提供法纪和政策咨询，帮助党员干部释疑解惑，避免误闯禁区。按照“谁容错、谁回访”的原则，完善回访机制，有针对性地分析、研究容错实例，对容错对象进行回访教育，做好容错跟踪记录，及时了解干部的思想动态、工作表现和生活情况，引导鼓励干部创新创业。四是健全容错纠错协同实现机制。建立健全干部探索创新的容错保护制度、改革发展的担当激励制度、容错纠错动态监管制度，协同实行相关部门容错定期沟通会商机制和决策执行效果容错跟踪评价机制，容错免责认定审核机制以及第三方容错评估、报告、纠错建议机制，为推进容错纠错工作提供制度张力，激励干部勇于担当、积极作为。